



回忆长兄左安武得先从我的父母、爷爷和家庭说起。

我父亲左桂湘读过几年私塾,又刻苦自学,熟读古典,算是一位文化人。解放前,他要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以独特的远见,拖儿带女闯荡上海大都市,还给我们起了具有上海特色的小名,大哥叫阿虎,大姐叫阿妹,我叫阿根,小弟叫阿四、阿五,小妹叫阿六。他梦想靠奋斗在上海滩扎根立足,而且切实付诸了行动,除自己在电上当售票员外,还开了一个小杂货店。这样,母亲除了料理家务,还可以领着大一点的孩子在家门口经营生意。

父亲的梦想被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枪炮声彻底粉碎了。我们家和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一样,丧失了安全生存的和平环境。为躲避战火,不得不举家返乡。到了家乡后,以种地谋生。由于人口多,日子异常艰难,住的是土墙草屋。冬天风大,是用稻草堵住窗口的,连现在的牛棚、猪圈都不如。

1944年,国民党还乡团从临泽镇下乡抓人,来到了蒋庄,他们无非是通过“赎人”而敲诈勒索农民的钱财。爷爷左寿明正在挑粪浇菜,见状即搁下粪桶,上前理论:“大白天的,你们怎能乱抓好人啊?”爷爷好多事、好多嘴的秉性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平时,他只要去临泽街上买东西,在庄上见了谁都要问:“我今天上街,你要代买点东西吗?”一个邻居递给他一只空油瓶和几枚铜板:“你替我买一斤麻油吧。”回村时,代买的东西多,像个跑单帮的。走到半路,拴在扁担头上的油瓶滑落到地面打碎了。他又赶紧回到街上买了一瓶麻油慢慢往庄上走。奶奶知道了这件事,和他吵了一架。这一次还乡团下乡,他又多事多嘴,灾祸降临了。一个还乡团团长姓徐的队长打了报告:“这家伙的女婿(雪明)参加了新四军!”徐队长生气了:“把他一块儿带走!”还乡团手上有枪,农民们敢怒不敢言。父亲从外地回来,急忙筹款,可是第二天清晨,我爷爷和另外几个人被还乡团无辜杀害,消息传到村里,大哥哭得在地上打滚,父亲请人去镇里抬回爷爷的遗体安葬。他惧怕还乡团再度行凶,赶紧外逃。

父亲隐瞒了逃亡的原因,在界首一个远房亲戚张玉珍家躲了十天左右的短工。当他得知这个有钱的亲戚刚刚当上了国民党界首区区长时,吓得要命,万一被临泽的还乡团发现岂不是自投罗网了吗?其实,张玉珍已经知道了父亲离家的原委,毕竟是亲戚,佯装不知,很大方地给了他不少钱,同意他异地谋生。

父亲漂泊到上海几年后,“三大战役”结束,解放军势如破竹地挺进到苏北地区,父亲壮胆回到了蒋庄。爷爷去世了,他的田亩自然归我父亲和大伯所拥有。当时全家有十亩左右水田,我们家人口多,田亩按人均分,土改时评为中农成份,可怜的大伯家人口少却评为富农。

解放初期正是大哥的少年时代,他品学兼优,成绩在小学名列前茅。姐姐没读完小学就务农了,为的是确保我读书。我们基本上能吃饱饭了,但我继续读书仍然缺钱。

长兄如父。家庭生活的重担除父母外,逐渐落在了大哥大姐身上了。他们协助父母辛勤耕耘,操劳家务。为了节衣缩食,父亲和大哥绞尽了脑汁。那年头,种田靠天收,经常发生洪灾。有一年发大水面临饥荒,大姐领着我登上本庄高大五

长兄如父

□ 雪安理

子的木船,投奔到上海郊区种菜的外婆家。一年后怕耽误我上学,又把我领回村里,就读南蒋小学。即使是丰收年,家里人多嘴巴多,供我上学也没钱交学费了。父亲和大哥商量,先送我到高邮武安教书的大舅吴士甫家,后又把我领回来过继给三叔,哪知三叔患肺结核很快去世了。我幼年时的奔波路上,都有大哥携手搀扶的身影。

1954年,爷爷惨遭杀害十周年忌日,姑父雪明向部队请了假,从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风尘仆仆地赶到蒋庄。他对父亲说:“我投奔新四军去华东公学,特地绕道来叫你一起去的,你为什么不肯去呢?”父亲无言以对,大哥在一旁说:“姑父,家里这么多人,父亲一走,我们生活怎么办呢?”大哥和父亲私下商量,决定恳求姑父把我送给他抚养。

大哥和父亲实现了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愿望。在送我离开故乡时,大哥领着我上了从界首开往镇江的小轮船。饿了,我们跟船上借了碗筷,把母亲炒熟的小麦面,用开水泡后充饥。在镇江改乘大轮船,次日夜晚到了南京。他叮嘱我要节约每一分钱,弟兄俩徒步从下关跑到新街口。我说:“哥哥,我实在跑不动了。”他只得掏出八千元(现为8角),合乘一辆尾部烧木炭的小汽车开往孝陵卫。月光中下了车,路边部队的大门敞开着,没有动静,我们往门边走去。突然,探照灯一亮,四周通明,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大哥把姑父的信交给持枪执勤的战士。他们看完后说:“深夜了,你们先住下吧,明天早上我们通知他来。”我和大哥进了门边的招待所。房间内,圆形的帐子折腾了半天才整理好,但躺下来怎么也睡不着。大哥讲到了家中的生活困难。他说,穷人家的孩子只有好好读书,长大了才能有本事做事情。他还说,父亲要我跟你讲清楚,不管哪个穷人家都不愿意把孩子送人的。这次,你是从糠箩里跳到米箩里,我们都是为你好,养功不抵领功,明天一见面,你必须喊姑父为爸爸!兄弟俩从大半夜一直谈到天明。60多年前的这番话,一直深深烙印在我脑海中。

大哥离世已十年了!我忘不了刚上小学时,抗美援朝、交公粮卖余粮、镇反等运动,和他一起参加了宣传队。他扮父亲,我扮儿子。晚上在汽油灯下演出,结束后我睡着了,他背我回家。我忘不了,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定地相信党,拥护党,热爱毛主席,没有一次参加打砸抢。父亲因逃亡躲在国民党区长家几天,被基层造反派认定为投靠敌人的反革命分子,含冤投河自尽,他仍然积极工作并尽力照顾好母亲和弟姐妹们。我忘不了他从事会计工作几十年,不占公款公物,不占集体米粮。我忘不了,在近千户的大庄子里,他没有与任何人吵过架,而邻里发生矛盾和冲突,双方都异口同声地说:“找左会计评理去!”我更忘不了,他按父亲的吩咐,在草堂的柱子上写了一副对联:待有空读书必无读书之时,待有钱济人必无济人之日。

是啊,大哥的成长进步离不开父母的言传身教。父亲克己忍让、律己好学,母亲吃苦耐劳、俭朴善良,这些道德风尚对大哥和所有的兄弟姐妹以及晚辈们永远是一本思不尽、读不完的良好家书!长兄如父,终生难忘。

收获金秋

□ 王三宝

南飞大雁的嗓音里,我听到了金秋之声。

这声音从大地腹部传来,穿越金灿灿的稻谷,在蓝天白云间飞荡。这声音豪迈、宽广、厚实,有灵性,只有贴近土地的人才听得真切。梦里,我和妻子仿佛听到金秋的呼唤,闻到农忙的气息,那些金灿灿的稻谷似乎向我们招手。晨起,打电话给岳父母,问何时收割稻子,他们说这个周日。我们想回去帮忙,他们说连几个“用不着”。我们决定回家看看。小舅爷常年在外打工,农忙也没时间回来。七十多岁的岳父平时就有点咳嗽喽喽,农忙就更吃力了。尽管是机械收割,忙时还是需要人帮忙。几十年不干农活的我们虽帮不上大忙,烧烧饭、拿拿接接还行。

周日,我们没有给岳父母打电话,早早起床,沐着秋阳从城里来到乡下,来到岳父母种植的田头。稻谷谦逊地低着头,静静地聆听来自大地母亲的嘱托,来自秋风秋阳的问候。它们要和蓝天白云告别,和生养它们的土地告别,和那些喜欢它们的蛙虫飞鸟告别。岳父一脸慈祥、一脸微笑,看着眼前的金黄。这是他经过春的播种,夏的拔节,秋孕育,辛勤浇灌出来的果实。他抚摸着稻谷就像抚摸自己的孩子一样,心中充满了喜悦。他站在田野上,像首长检阅士兵,像演奏家倾听深沉混响的音乐。他与稻谷蓝天构成一幅淡淡的水墨画,留白处是若隐若现的收割机,氤氲在金色的秋野。我从岳父的脸上读懂金秋的含义:闪亮、温暖、丰厚。收获金秋就是收获快乐和幸福。

来到岳父身边,我们同叫了一声“爸”,在田间看得入

神的岳父见我们回来,脸像稻谷般灿烂:“不是说不回来的吗?”

“你周日收割稻子,难得的机遇,我们就回来了。”

“你妈妈昨天在电话里说要你们不要回来,说过以后就后悔了。”

我和妻子相视一笑,暗自庆幸还是回来的好。正说话间,小姨子和在外做木工的连襟也赶回来了。此时,收割机正从北边向岳父的田里驶来。

驾驶员站在收割机上,手握操作杆,俨然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一排一排稻子,快速有序地吞进它的肚里,秸秆从右侧飞出,整齐落在田地,稻子被收入囊中,两三圈清理一回,装进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口袋里。不到半个时辰,一块地就割完了。连襟力气大,我们搭到他肩上,他扛上车。很快,我们把稻子拉到岳父母家门前晾晒。在这些过程中,我们没有让岳父做,他站在一边只是微笑。岳父老了,老成了我们的孩子,他不能再种地了。在我们的劝说下,他终于答应从这个冬季开始把田给别人种。他指着地面上的稻子说:“我买了34斤种子,收了6000多斤稻,每亩达1500斤,多有意思啊。”话语间流露出对收获的喜悦和对土地的眷恋之情。

我知道,失去土地,对种了一辈子地的老人来说,意味着失去收获的金秋,失去赖以生存的支柱,心里一定会空落落的。可我要大声对岳父说:“二老,放心吧。我们做子女的永远是你们收获的金秋。”

哥哥叫薛加祥,个子不高,胖胖的,憨憨的,看人总是笑眯眯的。看了电影《南征北战》以后,大家都觉得他像电影里的那个小胖子战士。薛战士有一句台词:同志,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还得靠我们步兵呢。于是大伙儿看见他,就喊他“南征北战了”。

薛加贵是弟弟,个子比老大稍矮,瘦瘦的,看人有点腼腆,一只眼睛有小疾,不注意看不出来。

加祥和我们这些插队知青差不多大,我们常在一起做农活,他上过学(我们来插队时,他就不上了;加贵还背着书包往学校里跑),和我们说有说有笑谈得来。

兄弟俩住在最西头,离村子有半里路远,离大河边(三阳河)很近。

去大河边附近的田里做农活时,他家是必经之路,这时,他家是最热闹的。先来的人都要在他家坐坐,等人差不多了再走。女人们进了屋,都要啧啧几声:乖乖!老立章家这多干净啊。两兄弟没有妈,跟着父亲过日子,三个男人在家,家里逸逸当当,什么东西该放哪儿就放哪儿。

哥俩的父亲叫薛立章,四十多岁,当过新四军,一条腿受过伤,走路有点跛,是位伤残军人,每个月还有点伤残补助金。老立章受过伤,不用干重活计,在生产队跑跑走走,做些小巧不言的事情。家里的家务,老少三人各忙各的,做得俏俏括括。父子三个的衣裳干干净净,只有补丁,没有破洞,缝补浆洗,三个男人都会。有女人笑说,哪个女的到这家子,真享福了。

加祥大了,就跟着爹爹(这里把爷爷叫做爹爹)学手艺了。爹爹七十多岁,腰板硬朗,白发白胡子,单住在村里,是位木匠,手艺好。岁数大了,不外出,专在生产队里修理、维护大小木制农具,特别是风车、水车。哪家砌房造屋都少不了老人家。

加祥给爹爹背工具箱,磨刨铁,磨斧子,锉锯齿,一坐半天,很有耐性。跟着爹爹选料,弹线,下锯,凿眼,刨光,投榫,一张凳子诞生了,一张柜子诞生了……大家都夸加祥手巧。

加祥大了,有人给他谈了个女孩子。女孩姓姜叫陶金。陶金一家四口,爸、妈,还有个比她小几岁的妹妹。陶金鸭蛋脸,大眼睛,见人就笑,一笑俩酒窝,两条辫子黑黑的,身材不胖不瘦,在生产队同龄姑娘中,她是出众的一个。陶金妈妈是大队妇女主任,是我们知青小组的生活辅导员,爸爸是个巧手,什么都会干。对于加祥,老两口一点意见不得。虽说薛家不富有,可加祥人好,这比什么都好。两个年轻人更是喜在眉头发笑在心里。陶金眼里的加祥老实敦厚,聪明能干。加祥看陶金走路,从前面看好看,从后面看更好看,两条手臂一左一右像风摆柳。

自有了这事,两个人就没有直接说过话,上工收工路上都是一趟人,没个单独走在一起的机会,即便迎面相撞,两人都是面孔一红,把头一低就过去了。加祥家住在村子西头,陶金家住在东头,加祥从来没有再去过陶金家(以前去没去过,加祥自己

加祥和加贵

□ 汪泰

道了他的想法,到了陶金家,跟她爸妈说:要征兵了,加祥要当兵去呢,让老薛家备点礼,挑个日子,下个小定吧(我们这里把订婚叫做下小定)。于是两家人在一起吃了顿饭,加祥和陶金到三垛街上拍了张照片,这事就算定了。去三垛的路上,加祥第一次觉得路上的风景真好看,天那么高,云那么白。这是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走这么远的路,十里多路,可怎么一下子就到了呢?拍照时,加祥第一次和陶金靠得这么近,他看见陶金的脸真红,他听见了自己和陶金两个人心跳的声音,跳得那么响。

加祥当兵去了。加祥寄了三封信回来,一封给他知青组里的朋友,一封给他自己家,还有一封是给陶金的。给陶金的信里还夹了两张照片。一张照片上,加祥穿着军装,帽子戴得端端正正,憨憨地望着她笑呢;另一张,身穿军装,双手握枪,一副严肃威武的样子。姑娘们问陶金,加祥在信里对你说了什么?陶金脸一红,说:保密。

加贵上了一段学,个子高了,不好意思再背着书包往学校跑,就正经上工挣工分了。

他比我小,平时我们相处得并不多。但有件事儿,我实在是忘不了。

那年深秋,大队按照上面的要求,在农闲时开办扫盲班。每晚借学校教室为大姑娘小媳妇扫扫盲。扫盲的老师两个,一个是我,一个就是薛加贵。

每天晚上,加贵早早来到教室,拉亮电灯(没电时,就带张马灯来,他总是把玻璃灯罩擦得雪亮),擦净黑板,等人到齐,点名。开始几天,图新鲜,一教室的人,后来就剩下近处的女孩子们。来的女孩子们可认真了。

成人用的扫盲识字课本,全是字词,了无趣味。我把扫盲课本上的字抄写在黑板上,再领大家读。女孩子们只愿读不肯写,说认得就行了,用不着写。我们两个老师只好将就着。

一次,我把“够”字写成了“狗”,我印象中似乎就这么写的。谁知一个女孩说,你写错了,写反了。我赶忙看书,原来我写的与书上的不同。我真不好意思,居然还写错字,有点儿窘。这时加贵说话了:没写错,可以这样写的,两种写法都可以。我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加贵又说,就照书上的来吧。我赶忙擦去“狗”,写上“够”。心想,以后可要注意了。

这件事,老是记在心上,直到一次遇到了字典,我查了,还真是两个字通用的。我不知加贵是真的知道两种写法都可以,还是帮我解围的。

没几天的一次晚课上,课本上教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词,读了几遍后,有女孩子问,广播里老说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是什么意思啊,讲给我们听听吧。我毫无思想准备,愣在黑板前,脑子急速转动,却找不到解释的话语,一时语塞。其实说是扫盲老师,我们连本字典也没有。

见我吊黑板,加贵又说话了:唯心主义就是瞎说,心里想什么,嘴巴就说什么,不实事求是;唯物主义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没有的不瞎说,是实事求是。嘿,我又一次帮我解了围。

我很感谢加贵。后来想想,他解释的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

村庄 (外一首)

□ 杨正彬

躺在你的怀里
我想学着你的样子
一忍,再忍
收起小河的轻唱
灭掉路灯的照明
接受一场没有预告的冬雪
挂断天南地北的电话

但我还是没有忍住
一阵一阵剧烈的咳嗽
半夜,将你
一次次地惊醒

父亲,又想你了
疾风敲打我的西窗
呼噜呼噜地响
我想,这不是父亲
父亲冬天才走的

不会这么快回来